

潘雨廷 著

潘雨廷著作集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拾壹

道藏书目提要

潘雨廷著作集

潘雨廷
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拾壹

道藏书目提要

引 言

潘雨廷先生(1925—1991),上海人,当代著名易学家。生前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、中国《周易》研究会副会长、上海道教协会副会长。潘雨廷先生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教育系,毕业后师从周善培、唐文治、熊十力、马一浮、杨践形、薛学潜等先生研究中西学术,专心致志于学问数十载,融会贯通,自成一家,在国内外有相当的影响。潘雨廷先生毕生研究的重点是宇宙与古今事物的变化,并有志于贯通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联系,对中华学术中的《周易》和道教,有深入的体验和心得。潘雨廷先生著述丰富,其研究涉及多方面内容,具有极大的启发性。他的著作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。本书由张文江根据潘雨廷夫人金德仪女士保存的遗稿整理而成。

《道藏书目提要》择取《道藏》286种文献写作提要,每篇提要介绍该文献的史实和内容,并阐明其意义,对编撰道教史和研究道教文献者提供了有用的线索。

自序

《道藏》今指明《正统道藏》及《万历续道藏》，可名《明道藏》。在明代前的唐宋金元各时代，道教皆得统治者支持而汇编其文献成藏。有关道教的书目，自《汉书·艺文志》起早有著录，汉末魏晋后数量激增。辑成《道藏》则始于唐玄宗，命崇玄馆道士编纂了最早的一部《开元道藏》，共三千七百四十四卷，分为三洞十二部，由道士张仙庭编成目录三卷，名《三洞琼纲》，天宝七载(748)诏传流布。北宋初，辗转经张君房辑成《大宋天宫宝藏》，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，时当真宗天禧三年(1019)。君房摘其要成《云笈七签》一百二十二卷，此书尚存，有《小道藏》之称。北宋末，徽宗于崇宁间(1102—1106)令道士刘道元为首校定《道藏》，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。政和中(1111—1118)送福州闽县镂板，数年间又略有所增，总四百五十函，五千四百八十一卷，名《万寿道藏》，《道藏》始有刻本。此藏于南方传至元代，于北方已残缺。金世宗大定四年(1164)补全经板，章宗明昌元年(1190)，提点冲和大师孙明道又搜访遗经，成《大金玄都宝藏》，凡六千四百五十五卷。元初宋德方遵其师丘长春遗志重刊《道藏》，经八年而成于乃马真皇后称制三年(1244)，以《元藏》别之，凡七千八百余卷，为《道藏》卷数最多者。惜

上述五种《道藏》今皆散佚。而明代《正统道藏》成于正统十年(1445),凡四百八十函,五千三百五卷。初有成祖于永乐四年(1406)敕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主其事,后有通妙真人邵以正竣其事,前后共四十年。《万历续道藏》成于万历三十五年(1607),凡三十二函,一百八十卷,由五十代天师张国祥主成其事。合刻成五百十二函,雕版十二万一千五百八十九页,板毁于清末庚子之乱。于民国十二年十月至十五年四月(1923—1926)经二年余,缩成涵芬楼影印本,凡一千一百二十册。由是流传全国乃至世界各国著名图书馆中,故《明道藏》已成为国内及国际上研究道教的主要文献。

自唐至明约有千年,《道藏》书目有增无已,可概见道教发展的史实。惟《明藏》已增当代的道书,然尚少于《元藏》,可见元初焚经使道教文献损失甚重。今《正统道藏》末附有《道藏阙经目录》二卷,即录自《元藏》。凡宋继唐,明继元,皆辑成于散佚之余。以《明藏》论,经唐末元初二次散乱,且道教本身亦有发展,故三洞四辅的体例仍同于古,而内容的编次难免混乱。又万历后道教已无大发展,尤其是未得清统治者的支持,故整个道教教义及史迹乏人注意。康熙间进士彭定求编成《道藏辑要》,收有崇祯时伍冲虚之说,对南北宗的教义自然略有发展,然对《明藏》之内容删削十之七八,且终清一代的道教似未出此范围。故全面观之,《道藏辑要》出而《明藏》废,道教即日趋衰落,始终未见能有包括《明道藏》的《清道藏》出。五百余年间尚未有羽士或学者能对《明藏》加以全面的整理与研究,对庞杂的道教教义,无人能总持之,掌握之,校正之,随时以革新之,乃民间以迷信为主的传统陋俗为道教,道教安得不濒于绝灭。

若《道藏辑要》之发展南北宗,未可忽视。继之清代的道教名著更宜加以收集和编辑。而当务之急,对《明藏》的内容必须彻底了解,以见自古迄明的道教教义与发展概况,亦为明代羽士所认识道教的整体面貌。故凡收入《道藏》的文献,宜逐书研习而作提要,此为最基本的

工作。计全藏书目约有一千五百种。明白云霁于《续道藏》成后二十年(1626)即成《道藏目录详注》，可谓通读全藏而留有痕迹的第一人。清陈梦雷于康熙四十年至四十五年(1701—1706)编成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对《道藏》书目的介绍全录白书而略为加详。迨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(1774—1791)编成《四库》，收有白云霁《道藏目录详注》，其提要曰：“所列诸书，多摺拾以足卷帙。如刘牧《易数钩隐图、遗论九事》、张理《易象图说内外篇》、雷思齐《易外别传》(案此本俞琰之书，云霁误以为思齐)、《易筮通变》、《易图通变》，旧皆入易类；《穆天子传》旧入起居注类；《山海经》旧入地理类；扬雄《太玄经》、邵子《皇极经世》、鲍云龙《天原发微》，旧皆入儒家类；《墨子》旧入墨家类；《素问》、《灵枢经》、《八十一难》、孙思邈《千金方》、葛洪《肘后备急方》、《急救仙方》、《仙传外秘秘方》、寇仲奭《本草衍义》，旧皆入医家类；《公孙龙子》、《尹文子》旧入名家类；《韩非子》旧入法家类；《孙子》旧入兵家类；《鬼谷子》旧入纵横家类；《鬻子》、《鹖冠子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子华子》、《刘子》、马总《意林》，旧皆入杂家类；《录异记》、《江淮异人录》，旧皆入小说家类；《黄帝宅经》、《龙首经》、《金匱玉衡经》、《玄女经》、《通占大象历星经》、《灵棋经》，旧皆入术数家类；陶弘景《华阳隐居集》、邵子《击壤集》、吴筠《宗玄集》，旧皆入别集类。虽配隶或有未安，门目或有改易，然总无以为道家言者。今一概收载，殊为牵强。盖二氏之书，往往假借附会以自尊其教，不足深诂。”此一考订图书分类，对道教为致命的打击。且道教本身，既成《道藏辑要》于前，统治者的观点又明确说明《道藏》所收书目与道教无关，则道教内容立时狭窄，缩之无已，终至无地自存。

乾隆后更有读《道藏》的学者，于《道藏》所收先秦或秦汉以来古籍仅重视其版本，完全忽略其内容有与于道教。自汉魏起所发展的道教，其形象在历史中已存在千年以上，至清而全毁，且不为清代的一般羽士与学者所理解。推究其原因，盖宋金元明的道教理论基本以理学

为质,乾隆后理学既衰,道教的精微处自然未能显出而不绝如缕。故今作《道藏》书目提要,当以每本书编纂时的观点观之,对所收集的文献,亦应认识其与道教的有机结合,方能理解由汉及明所形成的道教思想及其变迁。然则宜说明汉至唐逐步辑成《道藏》及唐至明《道藏》内容变化的复杂情况,亦宜考察同一时代有不同的道教思想,各有其承前启后的史迹,一如波涛交错的发展过程。把握这不割裂时空的唯物史观,始可明道教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,及丛集此约一千五百种文献的历史背景。

西汉末刘向、刘歆父子所辑成的《七略》,为我国最早的文献总集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已散其总纲“辑略”于六略之中,故分类凡六。六略为“六艺略”、“诸子略”、“诗赋略”、“兵书略”、“数术略”、“方技略”。以后世《道藏》观之,亦已兼及六略而自成总纲,此道与儒所以在我国思想史上能分庭抗礼。就汉代的社会思潮言,自汉武帝尊儒术斥百家起,以董仲舒所提倡的儒家为主,此“六艺略”所以出“诸子略”而为首。“诗赋略”属载道之文,以质言不外于六艺与诸子。以下“兵书”、“数术”、“方技”三略属专业学问,故另有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,太史令尹咸校数术,侍医李柱国校方技,此见当时的分工情况。汉初所尚的黄老,武帝后虽斥而未灭,且发展于民间,此黄老道之所由起。亦即儒家以六艺合诸数术与方技等,乃成董仲舒所尊之儒,而诸子皆属之。反之,道家取六艺中的《易》亦合诸数术与方技等,即成黄老道,而儒家属之。凡《易》属阴阳家之书,儒与道固可通用。今以马王堆出土的文献观之,在乙本《老子》前,尚有《经法》、《十大经》、《称》、《道原》四篇,当即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的《黄帝四经》。其他已佚而未发现的此类文献尚多,可见所谓黄老道于先秦早有典籍。以汉代论,黄老道哲理的形成,以司马谈、刘安为代表,实早于董仲舒所尊之儒。当两汉之际,谶纬盛行,犹道之华,亦为造作道经的必要条件。楚王英信奉黄老与浮屠,道教可托始于此,既增益黄老道的宗教色彩,亦为佛教传入之

始。当时尚未分辨黄老与浮屠的不同，惟与其时所尊之儒不同，此楚王英所以不得不自杀于明帝永平十四年(71)。是时《太平经》已渐积成书，以今存残本观之，其理论基础可肯定为黄老之说。然黄老道的《太平经》(于吉《太平青领书》)，宫崇上于朝，既不用于顺帝(126—144)；后襄楷又上之，亦不用于桓帝(147—166)；乃为黄巾所利用，信仰者遍及全国。不幸张角等大失败于灵帝甲子(184)，黄老之说由是而大半失传。另一方面，张陵创五斗米道于蜀，亦在顺帝时。其孙张鲁于建安乙未(215)降曹而保存其地位，故黄老道废而五斗米道兴。后人即以五斗米道为道教，而忽视黄老道可当道教。惟未究黄老道的历史渊源，所以视道教与先秦古籍无关。

黄巾起义虽遭统治者残酷镇压，被杀二十万人，而信黄老道者决不可能全灭，或隐而自修，或归五斗米道，或归佛教。是时有大批道书出世，译出的佛典亦日有所增，道与佛的分歧情况由此渐生。《抱朴子·释滞篇》曰：“道书之出于黄老者，盖少许耳。率多后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见而滋长，遂令篇卷至于山积。”更观《遐览篇》所载的道书书目，凡二百四种六百七十八卷，又有火符五十六种一百六十二卷，^{〔1〕}小符不可俱记。此类道书，皆出《七略》之外，而足以继“数术略”与“方技略”等，所以发展黄老之说。然当时的道书，亦仅以形式分书与图，尚未以内容分。葛洪成《抱朴子》于东晋元帝建武元年(317)，此大批文献尚系其师郑隐所收藏，故由此著录，可见汉魏晋初时道教发展的情况，亦可进一步合诸汉魏与西晋的社会思潮。

上已提及两汉时思潮大变于武帝，然黄老与儒术之争，三百年实未解决。武帝虽尊儒术而自信神仙，已为黄老道创造条件。其初百余年，于儒术内部积成今古文之争。篡汉的王莽盖主古文，然刘秀复汉后古文更盛行，可喻学术之争与政局变化相互有影响而不一定平行。

〔1〕 参阅《论〈抱朴子·遐览篇〉所著录的道经卷数》。

自东汉起,主要的学术思想矛盾已非儒术内部的今古文,而为儒术与黄老道之争。顺帝与桓帝既不用黄老道的《太平经》,终引起汉末的农民革命利用黄老道。结果黄老道虽失败,两汉的经学亦同时告终。乘时而起者,为何晏、王弼之说。王弼注《周易》与《老子》,则汉易废而玄易兴,黄老灭而老庄盛。以虞翻《周易注》、河上公《老子注》与王注并观,立见汉魏思潮的不同。承黄老道之说而至魏晋大兴的道教思想,实即保存黄老与汉易之理而益以数术与方技。王弼等所兴的玄学,反与佛教的般若思想可通。或仅以老庄有与于道教而未究道教之本乎黄老与汉易,则尚未见道教思想之源。若自左慈、葛玄、郑隐传至葛洪之说,乃属后者而非前者,宜其不以老庄之说为至言。葛洪一生的矛盾为儒与道而终归道,是犹尚黄老而斥儒术。此见汉魏晋初的道教,其理论基础仍属汉初的黄老。而在认识事物上,如天文、数学、理化、医学等各方面,自然各有发展,是即葛洪总结成的道教思想。其于文献重视《三皇内文》、《五岳真形图》、《墨子枕中五行记》等,皆黄老道的重要典籍,理当三才五行的变化,纯属我国本有的道教思想,与佛教无关。事实上,魏晋时代的五斗米道早与佛教接触而以排斥为主,西晋王浮作《老子化胡经》可为代表。而葛洪一字不提佛教,故亦不必“化胡”,此具民族思想的道教,方为传统的黄老道。

更以五斗米道而言,自张鲁降汉后六年,已为三国,鲁名为降汉,实为降操。故于魏,鲁之地位未变,仍为道教的代表,而其内部势必分裂,二十八治早已混乱。要而言之,黄老道的理论尚在,为曹操所收养者如甘始、左慈、郗俭、华陀等,亦皆与五斗米道无关。魏晋后信五斗米道者,有官吏以至帝王,亦有农民群众。惟其社会地位不同,故理论与行动的矛盾存在已久,而农民革命利用五斗米道日在发展。至于改革五斗米道教义又对后世有大作用者,早期有魏夫人(252—334),晚期有寇谦之(365—448)。然由汉末至东晋末(215—420)始终能得上下层群众信仰而不衰者,基本结合于民族立场,借此以排斥外来的佛

教。凡五斗米道起于蜀，故佛教入蜀较晚。然张鲁后之五斗米道，返回蜀地而有成者，为范长生（？—318）佐李雄，于北方如务勿尘、董谧、成公兴，于南方如杜子恭、王羲之，皆不姓张。故张姓后裔更开龙虎山的天师道，于南北朝隋唐已非道教的主流，《汉天师世家》之说殊未可信。张陵、张衡、张鲁三世后，五斗米道已非张氏世传。当东晋末，王羲之之子凝之，被同为五斗米道的孙恩杀于隆安三年（399），其内部分裂已不可调和，故统治者视五斗米道一如汉末的黄老道。孙恩、卢循既步张角后尘，五斗米道亦步黄老道后尘，终为统治者所消灭。然汉因黄巾而亡，东晋又因孙、卢而亡。以道教言，继葛洪而有代表性者，已当南北朝而分为二。

以北方言，北魏拓跋嗣神瑞二年（415）有寇谦之得道于嵩岳，于泰常八年（423）又自称受汉武帝时得道者、老君之玄孙李谱文之旨，劾召百神以授弟子，旋得太武帝拓跋焘之重用。因拓跋氏初入中原，必须用中原礼法以治民，由是寇谦之乘机而入。且其思想又回复至汉武帝之世，乃使黄老与儒术相合，以继承董仲舒之衣钵。故与儒家崔浩合议，使北魏改革有农民革命思想的天师道而用之，犹改汉顺帝、桓帝之不用《太平经》以致黄巾之乱。惟拓跋氏之愿学，故寇谦之改革天师道，恢复黄老道。儒仍用汉注，如郑玄之学尚行于北方可证。拓跋氏来自西域，习见佛教教义，与其武力入侵并不相合，故对佛教并不重视，而对初闻的炼外丹求长生不死药且能升仙极感兴趣。此开北魏以至北周各朝代基本以道教为国教之局面。故道教正式成为统治者的御用宗教，不可忽略寇谦之所起的作用。又北方以排佛为主，故继《化胡经》之楼观派，亦盛行于北朝。于道教文献的编辑，元赵思玄于延佑乙卯（1315）序林辂《谷神篇》曰：“北魏寇谦之尝集道经，为其书少，遂将方技、符水、医药、卜筮、讖纬之书混而为一。”作此序时，已距寇谦之近九百年，未详所据。然以理推之，寇谦之从成公兴学数学，史有明确的记载，且视成公兴为谪仙，则其数学自然包括卜筮、讖纬之术。又方

技、符水、医药，葛洪已取。故以寇谦之的地位而论，除所谓出于神授的《图箓真经》、《云中音诵新科之戒》等，必集道书，集则必与佛教争胜。故赵思玄之说，或非无据。最重要者，凡炼外丹的道书，基本传自寇谦之，然以形式改革天师道外，于道教教义似未作进一步发挥。故《道藏》之成，实在南朝。

以东晋言，思想尤复杂。既盛行老庄玄学，佛教尤风行，且玄学渐有不敌般若之势。而道教继承葛洪之理，尚非玄学，玄学不知内修而有清淡之弊。以道教言，其思想能有飞跃进步，就在以黄老道为基础，既合五斗米道而逐步改革，又能合老庄玄学，乃可与佛教般若若不即不离，相互周旋。而完成此一任务者，是东晋末年的陆修静（406—477），主要能立洞神、洞玄、洞真“三洞”为道教之纲。

考葛洪记其学于其师郑隐时的情况曰：“弟子五十余人，惟余见受金丹之经及《三皇内文》、《枕中五行记》，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矣。”于著录道经时，即以《三皇内文天地人》三卷为首。此见葛洪总结的道教，主于《三皇经》。以陆修静观之，《三皇经》属洞神，当三洞之一。此外洞真与洞玄，实发展而成于东晋。推其原，洞真本诸《黄庭经》，洞玄本诸《灵宝经》。于郑隐藏书中已著录《黄庭经》，或为汉末三国的古籍。信奉五斗米道而为祭酒的魏夫人，生于嘉平四年（252），《黄庭经》当已出世。迨魏夫人八十三岁卒于咸和九年（334），此经已大盛。《真诰》所记初次降灵事，时当升平三年（359），葛洪虽尚在世，或已未及知此类道经之合成。洞真亦为三洞之一，当时以上清经目之，属神仙家之说。若《灵宝经》屡见于《抱朴子》，郑隐书目中著录有《灵宝皇子心经》，又《灵宝五符》或亦已有。此经有云：“入山当以保日及义日，若专日则大吉，以制日伐日必死。”盖属五行类之书。故所谓《灵宝五符》似当五行，以一符当一行。此与葛洪从孙葛巢甫所撰《灵宝度人经》不同，《度人经》之理盖以《周易》的阴阳为主，巢甫利用灵宝之名而更作，以示其有据。进一步观之，阴阳五行本属同类，由是洞玄

灵宝亦成三洞之一。陆修静重视此洞,可见三洞之发展已在东晋,其原仍属葛洪。然陆修静的思想,既通老庄玄学,又受佛教影响。其于元嘉末年即太初元年(453)入庐山,当时的庐山早有道安(314—385)、慧远(334—416)的佛学。陆制灵宝仪轨,自然有取于佛教。

刘宋泰始七年(471),陆修静上《三洞经书目录》,初步完成以教义分类的道教书目。陆答宋明帝云:“道家经书并药方符图等,总一千二百二十八卷。云一千九十卷已行于世,一百三十八卷犹在天宫。”此上距葛洪已一百五十余年,道书又增加三四百卷,且内容亦在更新。郑隐之书是否全部保存,已未可知。考郑隐书目中有一部巨型道书,即《养生书》一百五卷,此证医家的养生法本属道教。及陆修静更以药方属之,则以《七略》论,《三洞经书》已全部包括“方技略”,〔1〕惜陆之详目已佚。更究三洞之源,即洞神三皇,本葛洪之说而直承黄老道。洞真诸经,本魏夫人重视的《黄庭经》以成《大洞真经》等,乃发展五斗米道。惟洞玄灵宝以葛巢甫造作的《度人经》为代表,既上承汉魏晋初的《灵宝五符》与《灵宝经》,犹使《黄庭经》与《太平经》汇合,亦即道教继《参同契》后进一步结合《周易》的象数,且难免已有佛教思想在内。因南方的佛道相斥与相吸兼用,与北方以排斥为主不同。故陆修静继承魏夫人之说,亦与寇谦之改革五斗米道不同。然当刘裕开国后起用陆修静,则陆与寇同,道教又成为南朝的御用宗教。陆既不以孙恩、卢循为是,反以裕与邦同姓刘,刘宋以复汉,有以击魏晋之篡汉;亦自当汉初的黄老道,其制定道教仪轨,犹制一代礼乐。惟能结合当时道教的发展事实,兼收并蓄而明确三洞,故非寇谦之一味复古可比。

合上而言,由葛洪而北寇南陆,寇有以发展道教之金丹,陆有以发展道教之哲理。此全本南北朝客观的社会因素所决定,故此一时期的道教亦南北异途,即北较保守而南多创新。以文献论,南朝继陆修静

〔1〕参阅《论医药与道教》。

的三洞,有孟法师的《玉纬七部经书目》、《陶隐居经目》及未详作者的《太上众经目》、《三十六部尊经目》等。

考孟法师有二,以大、小孟称之。大孟名景翼,梁天监二年(503)为大正。小孟名智周,有辩服法云事。以时考之,可同传陆修静之道。^{〔1〕}此《玉纬七部经书目》,或系两人同著。曰“七部”者,本三洞而以太清、太平、太玄、正一四类为四辅。《正一经·科戒品》云:“《太清经》辅《洞神部》以下仙品,《太平经》辅《洞玄部》、《甲乙中部》以下真业,《太玄经》辅《洞真部》、《五千文》以下圣业。《正一法文》宗《道德经》,崇《三洞》,遍陈三乘。”

由陆修静上《三洞经书目录》,仅三四十年,而道教教义有大发展。《玉纬》云:“洞神是神宝君所出,洞玄是灵宝君所出,洞真是天宝君所出。”太清者,孟法师云:“大道气之所结,清虚体大,故曰太清,以境目经。”太平者,《玉纬》曰:“六合共行正道之号也。”太玄者,孟法师云:“是太玄都也。”正一者,《盟威经》云:“正以治邦,一以统万”,又言法文者,“法以合离,文以分理”。凡《正一法文》一百卷,孟法师取之以总辅三洞三太。本此唐以前之文献记录,始可论南朝道教教义的变化,又可推究孟法师增四辅时所依据的客观事实。其以太清辅洞神者,犹明汉黄老道的发展。凡金丹之理,本天地人《三皇经》的三才之道,其于道教的发展,可兼及后世的内外丹,故此一洞辅乃道教中最有科学价值之处。其以太平辅洞玄者,盖以《太平经》辅《度人经》,然时间恰颠倒,且由此岸而归诸彼岸。今当正之,乃《度人经》法《太平经》而成。若《太平经》之理,仍得于汉黄老道的《三皇经》。然《度人经》的哲理,已较汉代有大发展,故此一洞辅与数理哲学、社会学最有关系。其以太玄辅洞真者,所谓五千文以下,实指魏晋所兴起的玄学。此老庄的哲理,与汉代所流传的黄老完全不同。洞真取魏夫人承五斗米道而继

〔1〕 参阅《孟法师考》。

方士之降灵术,此由原始宗教发展,又为道教迷信的渊藪。此为一切宗教或多或少皆含有的迷信思想,对心理学进一步发展是否有价值,尚有待科学的研究。又取太玄辅洞真,乃反映南朝玄学不敌佛教而归诸道教的事实。而玄学的思维既合于宗教,在我国有特殊的发展,即达磨由南而北以开禅宗,故太玄一辅又为禅之源。至于《正一法文》为正一部而遍陈三乘,犹恢复五斗米道的地位。因陆修静主刘裕的幻想既已破灭,则张鲁降汉归魏仍有可取处,不当因孙、卢而非张陵。孟法师继陆修静而益此正一,且以正一统三太、三洞,又见张鲁后所兴的五斗米道。故宋后天师道的独尊,不可不知孟法师之功。且道教千余年的发展,实未出此三洞四辅之范围,自明末而衰,仍在未明三洞四辅的实质。因信道者皆信妄为真而不求其史实,学者则仅知其妄而未求其所以编此妄言之故。如彭定求编《道藏辑要》,谓道教文献不可以时代次,此实大误。故欲理解道教教义,必须由三洞四辅入门,此为南朝道教之重要成就。惜历代学者每以陶弘景继葛洪,而忽略陆修静与孟法师,今说明其史迹,乃可了解道教文献分类的实质。其后继孟法师者,始属开茅山派的陶弘景(456—536)。《陶隐居经目》如何分类已未可知,然其推尊三茅君犹承汉黄老道,即洞神三皇;取魏夫人之《黄庭经》及降灵之《真诰》,则承重兴的五斗米道,即洞真诸经;《真灵位业图》以元始天尊为主,乃取陆修静承葛巢甫《度人经》洞玄之说。此见茅山派之有取于三洞。三茅君是否有其人,《真诰》中提及的汉代仙迹,较《抱朴子》所记更难信。然亦不可一笔抹煞,因汉代确有黄老道存在。陶隐居本身于医药养生之理有所发展,于进一步结合佛道亦有贡献。此外如《太上众经目》或指五千文以下圣业之文献,亦可能包括对老庄等古籍之注解。《三十六部尊经目》者,凡每洞有经十二部,三洞共三十六部尊经。然洞神除郑隐所传的《三皇经》,洞真除《黄庭经》、《三十九章经》,洞玄除《灵宝五符》、《灵宝经》、《度人经》外,当时极多。然必须凑足三十六部,难免内容混杂,于道教教义已无裨益。而十二地支数,

则本为《三皇经》所重视。或确指三十六部尊经之经名,或当时各道派所取亦不同,此已为不可深究亦不必深究之事。继之每洞分“本文、神符、玉诀、灵图、谱录、戒律、威仪、方法、众术、记传、赞颂、章表为十二部”乃释经之法,故三洞分三十六部与三十六部尊经的三十六部不同,义谓每部尊经皆须分十二部以说明此经之原委。此十二部可取,然亦不必每经必分十二部。惟有此三洞四辅十二部之规模,方可遍及道书而不乱,始有成《道藏》之可能性。

更以北方言,承寇谦之之道,道教文献亦在增加,然未必以三洞四辅分类。甄鸾于北周武帝天和五年(570)上《笑道论》,提及《玄都经目》云:“道经、传、记、符、图、论,六千三百六十三卷。二千四十卷有本,其一千一百余卷经、传、记、符、图,其八百八十四卷诸子、论。”合诸陆修静书目,此一千一百余卷的卷数相近,诸子及论,盖北方所增,故有二千四十卷。云六千余卷者,乃虚目不足信。惟其收入诸子,则《七略》之内容已备于道经书目,^[1]此可考见当时道教所包括的学术文化。

合上南北朝的道书,庶见《道藏》盖直承汉初黄老道而自成体系。唐孟安排著《道教义枢》即取此体系,此所以及玄宗能辑成《开元道藏》。

今更以历代文献的整理分类情况,与逐步形成《道藏》的情况相比。《道藏》者,实发展《七略》系统而成,对“数术略”、“方技略”有大发展。“诸子略”能随时增入当世的著作,亦为可贵处。儒家的文献学,继《七略》后,成荀勖(?—289)的四部。勖继魏郑默的《中经》而更著《新簿》,且有晋武帝太康二年(281)的汲冢大批竹书发现,此为复见古代文献的可贵资料。由勖的甲乙丙丁四部,及李充于晋元帝时(317—323)互易乙丙二部之次,始成至清乾隆时尚应用的经史子集四部。然

[1] 参阅《论〈七略〉与〈道藏〉》。

当李充定四部时，正值五胡之乱而南方初定，故书籍极少。且四部虽可增加书籍，如葛洪所保存的道书，四部中决不可能收入。又《七略》于“兵书略”、“数术略”、“方技略”属专业学问，四部皆入于子，实属最大缺点。其后王俭撰《七志》，方复《七略》之目。且“辑略”非目，乃增“图谱志”并附道、佛为《七志》。又梁文德殿目录，于四部外，集术数之书更为一部，由祖冲之子祖暅之撰其名，成五部目录，方能保存术数的专业学问。梁普通四年（523）阮孝绪成《七录》，除《经典录》、《记传录》、《子兵录》、《文集录》四部外，增《技术录》、《佛录》、《道录》，犹于五部目录外增佛道，则方合当时文献的情况。以道书言，是时已经陆、孟而成三洞四辅的纲目，与葛洪时大不相同。《七录》亦能继葛洪的图与书二类而为四，《七录》对《道录》的分类为：“经戒部二百九十种，三百一十八帙，八百二十八卷。服饵部四十八种，五十二帙，一百六十七卷。房中部十三种，十三帙，三十八卷。符图部七十种，七十六帙，一百三卷。右四部四百二十五种，四百五十九帙，一千一百三十八卷。”此分四类，仍不足与三洞四辅相比。论其数量与陆所上之《三洞经书》卷数相近，惟医经等不在其中，约可考见宋至梁道书所增的卷数。尚有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道书总目：“经戒三百一部，九百八卷。饵服四十六部，一百六十七卷。房中十三部，三十八卷。符篆十七部，一百三卷。右三百七十七部，一千二百一十六卷。”则与《七录》相似。又《隋志》准四部分类外，另有道经、佛经二类。隋唐起有此文献，方可见我国思想史上分成儒释道三教的具体内容。唐孟安排已见《隋志》，然仍须以三洞四辅十二部分类者，盖始能见道教教义。因《道藏》所收书，决非仅收道经，早已兼及《七略》而以黄老为主，且能充实历代所发展的各种专业文献，乃可与儒、佛相互周旋而鼎立成三。唐玄宗时辑成《开元道藏》前，先有《一切道经音义》。玄宗初年，史崇玄云：“据京中藏内见在经二千余卷以为音训，具如目录。余经仪传论疏记等文可易解者，此不详备。”此见唐玄宗时的道经卷数，盖与北周《玄都经目》卷

数相近。增入隋唐道经的卷数,约与“余经仪传论疏记等文”的卷数相近,其数或有千卷。乃据三洞四辅以分类,故《开元道藏》有三千余卷。可见《道藏》初成时,已包括先秦及汉魏以来与黄老有关的各种古籍,足与《七略》并观。惜以六艺经学为主之四部分类法,既代《七略》、《七志》、《五部》、《七录》而流行,其思想必以六艺为主而绝对尊经,凡专业学问皆入子部。而汉初黄老之说,虽发展成道教教义,其间如天文、地势、数学、医学、内外丹等,实属专业学问,于历代兴衰史迹及其内容变化,今惟可于《道藏》中得其文献。必由此观点,方能重见《道藏》之价值,亦见《四库提要》以儒家立场评论《道藏》收书不当之非。故必先恢复明以前的道教面貌,始可纠正主经学而忽略专业学问之偏执,以见我国思想文化之整体。因道教中的专业学问,在迷信的外衣下,内容不乏合理因素。即以书目分类法言,《道藏》之三洞四辅已能直接分析道经的内容,较《佛藏》之经律论、儒书之经史子集更有思想性。

当南朝形成三洞四辅的道教后,始有比较固定的教义。迨隋唐统一,若傅奕信道而以排佛为主,犹见北朝作风。孟安排之《道教义枢》本三洞四辅的体例外,进一步吸收佛教教义,则有南朝作风。又唐认李耳为祖,故唐之道教基本以老子为教主,则唐以后的道教已与先秦道家合一。若李筌发现《阴符经》而托名黄帝,本其自撰之说,得于寇谦之所埋藏。上已说明寇改革天师道与儒合流,实与董仲舒思想同类,已无须更尊黄帝之言。故李筌之《阴符经》虽或有本,已属唐人的思想,所以有超过帝王世系之志。其后盛传至今,且以《阴符》、《道德》为黄老,此唐代的黄老与汉初的黄老所以大异。又南朝有周智响、唐末有闾丘方远等重视《太平经》,因当乱世而思治,方有继承汉代黄老道的思想,此属洞玄太平。于内外丹的发展,属洞神三皇。其迷信的一面,即汉代的谶纬,实与内外丹无关,而有影响于炼内外丹的条件。于隋唐时,已渐重内丹,此与中医发展有关。隋唐的名医,如杨上善、孙思邈、王冰等,皆与道教密切相关。而道教自汉代起本包括医药养